

庚子事变后南洋华人对新政改革的评议与倡导

——以新加坡华文报刊《叻报》为中心的探讨（1900—1901）

张立朋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挽回声誉，重振民心，维护清廷的继续统治，刚刚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就颁布诏令启动变法，让社会各界各抒己见，由此拉开十年新政序幕。华文报刊《叻报》在1900年前后紧跟清廷的时局，积极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和战争的进程，并对运动的失败和时局的败坏痛心疾首。当1901年初两宫诏令新政后，《叻报》仍然紧密关注清廷的动向，大量转载国内与改革变法相关的奏折和文章，并为新政建言献策，其中隐含着南洋华人群体希望国家民族自立与强大的爱国之情。

关键词：《叻报》；清末新政；改革；自立

中图分类号：G219.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23）03-0114-08

1900年庚子之役失败对中国创巨痛深，这是继甲午之后中国人又一次面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出路问题，短短六七年，中国遭遇了两次重大的失败和耻辱。因此，清廷的实际统治者也开始对现状进行深入反思，此后清政府开始逐渐由被动走向主动，积极准备变法与改革。

1901年1月29日，刚在西安驻足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诏令^{[1]4601-4602}，其“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并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

虽然谕令主张变法，鼓励各大员条陈时弊、积极献策，但戊戌年间慈禧对维新派和主张变法

官员的血腥手段还去之不远、历历在目，所以各大臣起初都在闻风观望，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此外，时任督抚也对要上奏的变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可实施性进行了深入商议和探讨。4月21日，清廷再次下达谕令，要求文武百官“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谕观望”，并同时成立“督办政务处”，派专人督办政务^{[2]49-50}。清政府希望通过这次改革与调整，一方面重振民心，度过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为国家寻找一条出路，使国家能够达到富裕强大的境地^{[3]前言}。

此时，南洋华人群体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4]64}，报纸等新型媒介向南洋地区的民众传递最新的时局讯息。新加坡居南洋各国之中心，是商品贸易与文化信息的中转站。1900年前后的新加坡同时存在三份华文报刊，分别是《叻报》《天南新报》与《日新报》。其中《叻报》对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时局的关注度最高，新闻报道也最多，且其立场较中肯；《天南新报》^[5]此时偏向康、

收稿时间：2022-11-29

作者简介：张立朋（1995—），男，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晚清政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梁的维新派,政治立场有明显的倾向^{[6]6-10[7]63-71};《日新报》^[8]的办报时间较短,与前二者相比,对中国时局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报道相对较少。而《叻报》在宣扬中华文化认同和对华人群体的影响力方面^①,也远非其他报刊相比^{[9]266-267}。

以往学界对《叻报》与晚清政治的研究多涉及到甲午战争^{[10]56-64[11]121}、戊戌维新^{[13]97-118}和辛亥革命^{[14]65-70[15]},有关《叻报》与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研究则尚为欠缺。文章以《叻报》为基础材料,整理并分析其1901年对清政府试行新政的报道,拟探求其对新政改革的态度与看法,并通过分析《叻报》对清廷的建言献策来透视《叻报》对清政府的复杂立场,其间还蕴含着海外华人对国家民族生存和强大的希冀与期望。

一、《叻报》及其诞生背景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群体,基本上是以语缘和地缘作为人我区别的根据和社会分群的基础,且各方言群也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16]59}。因此,各帮派、会馆之间因利益与地盘的争夺时常发生冲突。虽然此一阶段的方言和宗亲组织有其身份与文化上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中的“乡土观念”则更加强烈。1877年新加坡中国领事馆的设立和1881年《叻报》的发行是新马华人群体中华文化认同发展的一个关键里程碑^{[9]300}。

1881年创办的《叻报》是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其创办人薛有礼出身于海峡华人的望族家庭,薛有礼属于在马来亚的第五代侨生。薛氏家族在马六甲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祖父薛佛记约于1828年迁至新加坡^{[4]25-26}。薛有礼的父亲薛荣樾也出生于马六甲,并多年为厦门第一批英国籍华商之一,其于1859年创办了“荣樾、茂源兄弟商行”。薛有礼曾担任汇丰银行的买办,并在之后创办了《叻报》^{[17]87}。薛有礼办报之初,厦门《鹭江日报》停办,在厦门经商的父亲薛荣樾将报馆旧设备买下,运回新加坡协助其办报^{[11]6}。所以《叻报》的创办与成功,也凝聚了薛氏家族多人的心血^{[17]87-88}。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时任清

廷驻新加坡领事的左秉隆也对《叻报》的创办有所推动^{[18]18}。

《叻报》具体创办时间^②为1881年12月10日^{[19]43-47},停刊于1932年3月31日,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叻报》现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但其初创时期的报刊已经遗失,目前所存最早的一张出版于1887年8月19日,列1724号,1932年3月31日为最后一期,列14781号,也就是一共出版了14781期^{[20]24-26}。在此期间,《叻报》一直以日报的形式出现,每周出版六期,周末休刊一期,春节等重大节日也会放假休刊。《叻报》刊名源自福建话和广东话对新加坡的称谓——“石叻坡”,“石叻”一词是由马来语“Selat”(“海峡”之意)转译而来^{[4]25}。

《叻报》能够维持半个世纪之久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薛有礼重金聘请到了时任香港《中外新报》的记者叶季允来出任《叻报》主笔。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原籍安徽古歙蓝田村,后移居广东番禺,19岁入香港《中外新报》负责采访,开始了其报业生涯^{[20]44}。叶季允自1881年主笔《叻报》,直至其1921年9月去世,前后达40年^{[12]14},成为新加坡报业担任此职最长的人^③。需要指出的是,薛氏家族因早在乾隆年间就已在马六甲等地经商,其对清廷并无特别的政治立场,主要以商业经营为主;但其时代仍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并利用其积累的财富回馈祖国与社会。通过叶季允主编的《叻报》来看,其主要落脚点也是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变法能够自立强大,摆脱当时贫困落后的局面。

《叻报》刊登的内容,除社论外,还刊登清廷谕旨、公文、奏折,以及南洋各地殖民征服的报告。中国的新闻来源,多采自上海、香港的报章,欧美电讯以及海外通讯网的稿件。甲午战后,《叻报》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中国国内,对中国问题和中国政局发表见解,表明立场,影响社会舆论^{[21]84}。《叻报》的立场一直都奉清廷为正朔,维护清朝的正统地位^{[20]25,47}。1907年

后清廷的新闻不在占据要闻的位置, 被转入附张的背面, 至 1911 年后完全消失^[449]。在此期间, 《叻报》对中国时局问题, 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非常详细, 从中可以一窥南洋华人知识精英对时局问题的看法与建议和对清廷的立场与态度。

二、《叻报》对变法的认知与评议

清廷变法上谕的颁布, 正符合《叻报》一直以来主张变革的立场, 自 1901 年 3 月份起, 有关变法的论议就占据了《叻报》报道的重要位置, 《叻报》也转载国内《申报》和《新闻报》对变法评议的文章, 借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虽然《叻报》也认为“行新法、汰旧弊固为今日中国急切不可须臾缓之事”, 但“就国人之智愚才力衡之, 此时变法之材未具, 变法之机未动”, 所以最终说到“窃谓改弦更张宜俟三十年, 少亦十年之后”。^{[22]1-2④}紧接着作者指出“变法之说要在征之实事, 非徒垂之虚文”, 并进而提出质疑: “以次第言今日中国。朝政宜变也, 然谁究内治, 谁达外交; 兵制宜变也, 然谁任将才, 谁娴战阵; 教育宜变也, 然谁号专家, 谁胜师范; 商业宜变也, 然谁洞市情, 谁详物产; 农桑制作无不变也, 然谁识土宜, 谁精考验, 谁工营造, 谁作聪明。凡此数大变, 皆为变法之原。”^{[22]1}作者认为今日之中国在朝政、教育、商业与农桑等方面皆需变革, 但是此时的清政府积弊过重, 且国人的素质未能达到变法的要求, 因此改弦更张要徐图缓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在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等人的倡导下, 清政府开启了洋务运动的改革, 这既是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性回应, 也是清政府力图图强的实际行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之前的具有局限性的改革流于破产。甲午以后, 中国人即开始进一步寻求富国强兵的变法之道, 但此后的戊戌维新又一次遭到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 除了西太后的血腥镇压使人记忆尤深之外, 康、梁的不明国情和急功近利也使

知识分子反思尤甚, 认为其是造成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中国近四十年的变法改革均遭失败, 鉴于此, 对于此次清廷的变法之议, 南洋华人展开了大胆而又谨慎的讨论。因此前改革的失败, 所以“变法岂易言哉, 使非斟酌乎轻重, 权衡乎得失。无论当变而不变, 不当变而变, 其贻误较不变尤甚”。此外, 变法对于行事之人也要求极高, “至于当变者而不善变之, 或误于因循, 或激于欲速, 或袭于皮毛, 或仅为掩饰。”因此, 变法不易, 若行变法, 对于当变之人及所变之事, 必须慎之又慎, 否则“虽变犹不变也”^{[23]1}。紧接着作者分析列举了数十年来中国在工艺、兵政、商务、仕途、矿务、储才肆武之法等方面学习西法进行变革的历程, 但数十年来“中国之弱尤甚、中国之贫犹是”。所以“不以为变之未得其道, 而以为弊在不能尽变, 欲使举国改弦而更张”的“激变”思想才造成了康梁的躁进, 而真正的原因则在于“实变不得其法”^{[23]1[24]1, 8⑤}, 且“治法无新旧, 但宜择善而行”^{[25]1}。由此可见, 经戊戌一变, 国人对变法之事尤为谨慎。

对此前康梁维新操之过急之评议并非只建于南洋华人群体, 国内的知识群体和日本人也对其有类似的见解。1900 年下半年, 内藤湖南曾以《万朝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游历, 归国前夕, 在上海专程拜访张元济, 两人纵论时事、人物, “为此行最后的佳兴”^{[26]134}。在谈及变法之时, 张元济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变法做出反思: “我国四十多年前就有变法的主张了, 效法西方的人也不在少数, 可是成效甚微。现在的所谓洋务人才, 只知道皮毛而不得精髓, 正是他们舍本逐末, 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26]137}在谈到戊戌之时, 内藤湖南也指出了康有为的激进与极端, 不但造成了变法的失败, 也使追随他的人蒙受了同样的灾难^{[26]138-140}。张元济对中国过去变法的评价与《叻报》的看法殊途同归, 均认为要以培养人才为先,

要学习先进思想的精髓，而内藤湖南则直接指明戊戌变法失败之“急”。

但自维新势力被清除出朝局之后，旧党把持朝政，诛除新党，专以顽固习气保全富贵却也是事实，且由此“贻误国家，而几于社稷不保”。因此，国人也从庚子国变后看到变革图强的时机，《叻报》转载《新闻报》的评议便就此指出此时变法的“四大”时机^{[27]1-2}。

《叻报》对此前改革反思的主旨在于勿要急功近利，要在完全吸纳先进经验的精髓和符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所展开，或许可得好的成效。戊戌变法的经验在前，若只追求速率，不但会造成变法的失败，还会给他人带来灾难。

三、《叻报》的时局分析与新政倡导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所面对的现状是一片狼藉，百废待兴。如《叻报》所言：

今日者，庭户洞开，五洲万国各待其轮船、铁路之利，雾屯云集于斯。初尤以中国为贸易之场，各谋其利；继更以中国为砧上之肉，咸思竞取一脔。数十年来，琉球归日，安南归法，缅甸归英，朝鲜自主，日人又割我台湾全省，藩篱尽撤，几于无险可设，国何以守？然幸内地尚能节节防守，尤可以为善。国乃自拳匪肇事，联军入京，宗社震惊，翠华西幸，时局糜烂几至无可收拾。虽乱由拳匪，曲诚在我，致动各国共愤……现在和议已成，重敦玉帛，朝野上下，鲜不以为从此可休养生息，不必再虑有兵戈之事矣。^{[28]1}

因此，前事之失即为后事之师，举国上下开始思考、计划行新政。其中教育是新政首先进行改革的领域，《叻报》也在此时较多的谈论改革学校章程和培养新式人才的方法：“诏令各省亟考取学识明通，年力强富，已解西文西语之举贡生。大省三十人、中省二十人、小省十人，遣送出洋游学……业成回国，量其造就，畀以事权，然后张弛有机，操纵有据。”^{[22]1-2}

在改革学堂方面，其指出“欧美望国治民，曰教、曰养；中国惟养而已矣”的不足。自古延续，乃至今日“无文、无行、无学、无教、无足轻重之，各府州县学盖已尽失当时教士之精意矣”，所以“今欲植人才收宏效，必自整顿学校始；欲整顿学校，必合学校书院为一始”，待到“新学大明，教术大备，人有专学，学有专教”，才能“获真才以济时”^{[29]1}。在设立学堂后，也要先定普通学章程（意指普通学问，相对于专门之学，也相对于西学），作者认为，欧洲各国玩中国股掌之上者，“无非恃其人才之盛、实学之多。故中国而欲与之争能，自不能不学彼之学”。但学西学“然亦必中文通达，则西学方为有用”^{[30]1}。作者此想法似乎与中国派遣留学生留洋学习西学有关，某些学生因长时间接触国外的学问与思想，以至于本身对中学却不甚了解，回国后不清楚中国的实情与时情，乃至其一身西学无处施展。作者进而指出：“欲学中学，则必先定中学章程，不繁不简，皆归有用……人云中国之贫在富贵之不均，我谓中国之弱在乎学问之不均。若效普通之法，则学问何患其不均，而人才又何患其弱于欧西哉。”^{[30]1}

“人也者，国之始基；国也者，人之归宿，此其互相维系之谊”。^{[31]1}因此，不论是对教育形式改革还是对学堂改革的建议，其落脚点是一致的，即对选才用贤的重视。况且“以目前时局观之，我中国事机之急，应变之难，固有超出寻常万万者”。而当时的“忧时之士与夫钓誉之流，或则过激而言，事难实践；或且随声附和，理未深求。徒逞一时忖测之私，不问家国将来之祸”。^{[32]1-2}张元济也曾指出：“我在南洋公学做事，专管译书事务。至于生徒、学术方面，另有何梅生嗣焜先生为监督。大约学期八年，普通学和政治学能略识大体。现在只有两年的程度，规模还远没有固定下来。”^{[26]137}内藤湖南也据此指出，明治维新早期的洋务人才多轻佻浮薄，“只会巧弄言辞，不会读书思考”，但其又继续说道：“贵国数年

以后,也会出现沉思发明之人。”^{[26][37]}这说明,人才的培养既需要向西方学习,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与融汇,因此选才举贤也实因时势和实情而迫不及待。

此次新政,清廷虽然是为形势所迫,但其态度则相对真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舆论界更是热议不断。“行新政,当慎选真才”,如此才能“济时坚”,亦可“改弦更辙”,乃至“四百兆又何足惧耶”!^[33]《申报》也因蝇营狗苟之徒误事误国,乃作“慎重佐使人才说以告今之轺轩采风者”。^{[34]1-2}《叻报》甚至因“我中国民数之众、民俗之循、民力之坚、民心之智,苟能人人有家国相维之思想”,为眷顾宗邦,乃详细列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四“道”而“各保其身,以保吾国安在,其不日即富强而驾乎欧美群雄之上”。^{[31]33-34}此中除寄存华人对中国的建议与希望外,也显露出其对清廷所面对艰难时局的无奈与无力。

因《叻报》所处南洋之位置,其不仅关注祖国之事,还时常评论其他国家之时事,并根据时势的变化来提醒中国要奋力图强。1901年11月2日,《叻报》转译了日本报刊所刊登的时局分

析的文章,其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处境,并根据东亚的时局之势而选择对华的政策。《叻报》在文后说到:“然中国之人观于此论可知,日本见中国能自立,即亲英以保亚洲之和局,苟其不能自立,即将亲俄以分中国之利益,可不惧哉!今中国力行新政,方且自以为醉梦渐醒,有日新之像,而日人尚有此等议论,其果已默,窥中国之隐,断难发奋自强乎?窃愿中国知事机之甚迫,鉴祸患之日深,知东乡之难倚,速求自立也。”^[35]其“速求自立”之愿望也可总结《叻报》对中国一以贯之的期待与态度。

此外,《叻报》还大量的转载国内倡言变法的文章与评论,自1901年5月30日至6月27日,《叻报》前后共18期在社论处连载张謇的《变法平议》^⑦,这也是在庚子国变后第一次长篇幅的连载文章^{[36]1, [37]1}⑧。此后《叻报》开始频繁的转载与变法改革相关的文章,连续两期摘录香港传教士王炳耀上书李鸿章的文章^{[38]1}⑨;前后四期刊登安徽巡抚王之春上奏文章第一折^{[39]1-2, [40]1}⑩;前后八期连载刘、张二帅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41]1-2, [42]1}⑪;前后12期连载第二折^{[43]1, [44]1}⑫;前后十一期连载第三折^{[45]1, [46]1}⑬。

文章名称	原作者	《叻报》刊登日期	期数	备注
《张季直殿撰奏变法平议》	张謇	1901.5.30-1901.6.27	前后连续刊登18期	
《摘录香港教士王炳耀上合肥李傅相要政条陈十则》	王炳耀	1901.7.9-1901.7.10	前后连续刊登2期	
《安徽抚宪王芍棠中丞奏覆条陈第一折》	王之春	1901.8.6-1901.8.12	前后连续刊登4期	文章在此时间段内并非每天都刊登。
《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	刘坤一、张之洞	1901.8.24-1901.9.6	前后连续刊登8期	
《刘张两制军遵旨筹议变法第二折》	刘坤一、张之洞	1901.9.7-1901.9.24	前后连续刊登12期	
《刘张两制军遵旨谨拟采用西法第三折》	刘坤一、张之洞	1901.9.30-1901.10.18	前后连续刊登11期	

1901年《叻报》部分刊载国内有关变法的奏折和文章

由上表可见,《叻报》对清廷行新政的政策极为重视,此时国内略有影响的上陈奏折,《叻报》基本都不惜篇幅进行转载刊录,且其多置于头版

社论之处,它支持维新与改革的态度也由此可见一斑。1901年,新政由教育领域率先展开,人才乃国之基石,当时的清政府需要识事之人,但更

需要识世之才，与世界大势接轨，才有摆脱贫困与落后的处境。此后，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督抚积极上书，力陈变法之议，希望国家能够求得“自立”，《叻报》也是表明态度支持新政与改革。

四、结语

1882年，清廷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组建了名为“会贤社”的文学团体，由左氏定题，每月举行诗文比赛，并给予优胜者奖励，而《叻报》则为其提供了主要的刊发平台^{[47]9-15}。此后，左秉隆把“会贤社”改为“图南社”，目的也一如此前，左氏的继任者黄遵宪也遵循前任的政策，取得了更有成效的成果^⑨。因中华文化在十九世纪末新加坡社会中的大力传播，也由此在这荒陬遐域、南天海隅而形成由华人知识精英组成，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但却又不受清朝政府制约的文化空间，在此空间内，华人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时局的走向，在儒家文化与道德价值的内在影响下臧否人物，评论政事。

通过上述可看出《叻报》对维新的态度。此时所刊载的文章一直在反思中国几十年来变法失败的原因，且也在提醒改革要符合其道，并要选对变法之人，由此培养人才就尤其重要。此外，除了分析时局与出谋划策外，它还连续几十期在社论处刊登国内督抚大臣、名人志士倡导变法、给予改革建议的奏折和文章，可见其初心仍是希望中国可以吸取几十年来学西法不成、仍贫弱受欺的教训，希望通过促改革与行新政可以自立、自强，不再任人宰割。

注：

- ①此时《叻报》的发行量也在持续增加，于1900年前后稳定在550份左右。
- ②因早期的《叻报》已经遗失，所以有关《叻报》的创刊日期一直有所争议，一般认为是1881年12月3日或1881年12月10日，本文采用王慷鼎先生所考订的12月10日。
- ③陈著和吴著都在其文中写明叶季允主笔《叻报》达40年，

并有明确的时间证明，夏文强在其文章中写到叶季允主笔《叻报》26年，应为笔误，其可能把薛有礼的逝世时间（1906年）误当为叶季允离开《叻报》的时间，特在此说明，参见夏文强《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以1887—1895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 ④自1901年3月份起，《叻报》的资源扫描出现了错误，每期的第2页被误排置到下一期的第2页，依次类推，直至1901年结束。为了学术要求的规范，注释处仍采用标准的注释方式。
- ⑤《变政宣言》一文也悉数分析数十年间中国在改革学习技艺、实学、经费、事权等方面的努力，把其最终之失败的原因也基本归纳于“行西法未得其道”，参见《变政宣言》。
- ⑥此文为《叻报》转载《申报》的文章。
- ⑦《变法平议》是张謇的代表作之一，于1901年3月27日刊于《申报》，文章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张謇关于变革的政治主张。其变法的内容共有42条，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并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行，有两万余言。
- ⑧《张季直殿撰奏变法平议》《十七续张季直殿撰奏变法平议》等，此期间内共18期连载。
- ⑨《摘录香港教士王炳耀上合肥李傅相要政条陈十则》，《叻报》1901年7月9-10日连续两期连载。
- ⑩《安徽抚宪王芄棠中丞奏覆条陈第一折》《三续安徽抚宪王芄棠中丞奏覆条陈第一折》，《叻报》从8月6-12日前后四期连载。此外，《叻报》也在非社论版面刊登王之春后续的奏折，此处不再列入。
- ⑪《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七续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叻报》自8月24日至9月6日前后8期刊登。
- ⑫《刘张两制军遵旨筹议变法第二折》《九续刘张两制军遵旨筹议变法第二折》，《叻报》自9月7日至9月24日前后共12期连载第二折。
- ⑬《刘张两制军遵旨谨拟采用西法第三折》《十续刘张两制军遵旨谨拟采用西法第三折》，《叻报》自9月30日至10月18日前后共11期连载第三折。
- ⑭此时《日新报》的掌控者林文庆博士在新加坡大力倡导与推广儒家思想，因此《日新报》时常刊发有关儒家道德礼教的文章，可见林文庆《论儒教》《论儒教续》

《论儒教再续》。林文庆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与宣扬, 无论对儒学的发展还是研究, 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英属马来亚殖民地甚至以“圣哲”之名而享誉西方。有关林文庆儒学思想的研究可见严春宝《他乡的圣人: 林文庆的儒学思想》《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林文庆传》。

参考文献:

- [1]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五)[M], 中华书局, 1958.
-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七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3] 楚双志. 变革中的危机: 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8.
- [4] 陈蒙鹤.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M] 胡兴荣, 译.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8.
- [5] 李晓涛. 《天南新报》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 [6] 庄国土. 论清代华侨与海外保皇派[J]. 八桂侨刊, 2012(2).
- [7] 茅海建.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 [8] 李麒麟. 近代新加坡华文报纸与华侨民族主义思想: 以《日新报》为中心[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 [9] 颜清煌. 新马华人社会史[M]. 粟明鲜, 等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 [10] 盛波. 甲午战争期间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 以《叻报》为视点[J]. 抗战史料研究, 2014(2).
- [11] 常萌萌. 《叻报》对甲午战争报道的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5.
- [12] 夏文强. 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 以1887—1895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5.
- [13] 段云章. 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 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J]. 近代史研究, 1998(5).
- [14] 徐炳三. 辛亥纪念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加强: 基于《叻报》为中心的考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2).
- [15] 贾明慧. 新加坡华侨革命报纸与辛亥革命研究: 以《中兴日报》为中心[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 [16] 李元谨.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C]// 李元谨, 新马华人: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2002.
- [17] 宋旺相.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M]. 叶书德, 译. 新加坡: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1993.
- [18] 柯木林. 新加坡领事馆左秉隆: 事迹与历史评价[C]// 刘泽彭, 编. 互动与创新: 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9] 王慷鼎. 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M]. 新加坡: 新加坡新社, 1987.
- [20] 吴庆棠. 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 [21] 柯木林. 石叻史记[M]. 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7.
- [22] 变法私议. 叻报[N].1901-03-09.
- [23] 论变法. 叻报[N].1901-04-02.
- [24] 变政刍言. 叻报[N].1901-11-12.
- [25] 才德辨. 叻报[N].1901-03-18.
- [26] 内藤湖南. 燕山楚水[M]. 吴卫峰,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7] 论变法机会. 叻报[N].1901-03-30.
- [28] 论中国急图自强不外练军制造. 叻报[N].1901-12-20.
- [29] 整顿学校议. 叻报[N].1901-04-13.
- [30] 论中国设立学堂宜先定普通学章程. 叻报[N].1901-10-29.
- [31] 论强国以强身为本. 叻报[N].1901-10-31.
- [32] 时局问题. 叻报[N].1901-08-13.
- [33] 论行新政当先慎选真才. 叻报[N].1901-10-30.
- [34] 慎重佐使人才说. 叻报[N].1901-08-03.
- [35] 论中国宜求自立. 叻报[N].1901-11-02.
- [36] 张季直殿撰奏变法平议. 叻报[N].1901-05-30.
- [37] 十七续张季直殿撰奏变法平议. 叻报[N].1901-06-27.
- [38] 摘录香港教士王炳耀上合肥李傅相要政条陈十则. 叻报[N].1901-07-09.
- [39] 安徽抚宪王芍棠中丞奏覆条陈第一折. 叻报[N].1901-08-06.
- [40] 三续安徽抚宪王芍棠中丞奏覆条陈第一折. 叻报[N].1901-08-12.

- [41] 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 . 叻报 [N].1901-08-24.
- [42] 七续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 . 叻报 [N].1901-09-06.
- [43] 刘张两制军遵旨筹议变法第二折 . 叻报 [N].1901-09-07.
- [44] 九续刘张两制军遵旨筹议变法第二折 . 叻报 [N].1901-09-24.
- [45] 刘张两制军遵旨谨拟采用西法第三折 . 叻报 [N].1901-09-30.
- [46] 十续刘张两制军遵旨谨拟采用西法第三折 . 叻报 [N].1901-10-18.
- [47] 梁元生 . 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M]. 新加坡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意室联合出版, 2005.

Reflections on and Advocacy of New Deal Reform 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

——Discussion Centered on Singapore Chinese Newspaper *Lat Pau* (1900–1901)

Zhang Lip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reputation, revive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nd maintain the continued rule of the Qing court, Empress Dowager Cixi, who had just fled to Xi'an, issued an imperial decree to initiate the Change of Law, allowing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hus kicking off the ten-year New Deal. The Singapore-based newspaper *Lat Pau* followed the Qing court's current situation around 1900, actively reporting on the movements of 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and deploring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n the two palaces decreed the New Deal at the beginning of 1901, *Lat Pau* still closely followed the Qing court's movements, reprinting a large number of memorials and domestic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reform and change of law, and offering 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New Deal, which implied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outh Pacific for the country's nationa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Key words: *Lat Pau*, The New Deal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Reform; Self-Reliance

(责任编辑: 关欣)